

2017年10月26日早晨,我的手机响了,是马鸣玉打来的,他嗓音嘶哑,告诉我忆明珠走了……让我一下子回不过神来。

我怔怔地站在书架前,顺手抽出先生当年赠送的《抱叶居手函墨迹》,又翻出我去年出版的《文化名人与“涛声依旧”》一书,看着上面我与他的亲切交谈并共进午餐的照片,记忆如潮水般地涌上了心头……

那是2015年3月28日,我在南京老作家马鸣玉(路桦)的陪同下,在位于南京黑龙江路上的汇林绿洲小区,拜望了我崇拜的诗翁忆明珠。

那天阳光很好,小区很安静,桃花开得正盛。迎面吹来微微的熏风,将沁人心脾的花香送入心田。

老人住在10楼,有电梯。门铃一掀,诗翁已在门口迎候。穿一件薄薄的大红滑雪衫,他那长得酷似达摩的脸上,堆满了笑容。老人的手温暖、有力,他居然还记得当年江都车站与我邂逅的情景。一位88岁的高龄老人,记忆力如此鲜活,让人十分惊讶。

诗翁家的客厅宽敞明亮,先生坐在一把藤椅上,满心欢喜地摩挲着手中的“一把抓”(是路桦送他的一把小茶壶)。不一会儿,便让夫人放上茶叶,嘴对嘴地喝了起来……先生的话语很有趣,无遮无碍,俨然是对知根知底的挚友一般。先生算不得健谈,但话语中听。曾听家乡老友苏位东说过:“忆明珠的诗好,比不上他的散文好;他的散文好,比不上他的谈吐好。”果然是脱口珠,浸润肺腑……倘若无缘与诗翁面晤,决难有这样真切的感受。

这天,诗翁谈兴甚浓,让我们如坐春风。夫人从书房捧出两本厚重的《抱叶居手函墨迹》,诗翁签上名后交到我俩手上。这是一本由青岛出版社出版的忆明珠手函墨迹影印集,收有数十封他写给友人、亲戚的毛笔手书信函。这在电脑、网络、手机短信、微信铺天盖地的当下,实属希罕之物,“见字如面”,让人倍感亲切。这些手书信函中的墨迹,闪烁着灵性与人性的光芒,凝结着情感与哲思的交融……

在先生的书房,我们看到了更多的书画作品(诗翁送了我俩各两幅字)。那一摞摞的册页中,随处可见他对中国毛笔手书的情有独钟。已近90高龄的耄耋诗翁,看淡世事沧桑,墨砚勤耕不辍。他远离尘嚣,甘耐寂寞,守砚伏案,墨函畅言,儒雅书卷之香满笺。

告别了诗翁,坐在回沪的高铁上,我的思绪如云……是的,对当代诗坛稍有了解之人,对诗人忆明珠的名字不会陌生。

20世纪50年代我开始学诗,在贪婪阅读、摘抄名家诗作时,便记住了忆明珠的名字。

50多年过去了,我依然能一字不差地背诵这样的诗句:

我是块石头,  
我是块有生命的石头,  
我是块有名有姓的石头,  
我是块有血有肉的石头!

(《跪石人辞》)

还有《狼张歌》《唱给番茄花的歌》……

这些诗作,在当时之所以能引起很大轰动,如磁石般吸引文学青年,并非全然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审美趣味和氛围所致,而是诗人充沛的激情和独特的发现、独特的感受,如刀子般地刻在了读者的心上。

忆明珠早期诗集《春风啊,带去我的问候吧》收集的都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诗,若干篇至今仍可使我们领略到某种虽属不可复返,亦无可争议的诗的特有魅力。

忆明珠姓赵名俊瑞,1927年出生于山东莱阳,参加过解放战争,去过朝鲜战场,后下放仅征28年。1979年调江苏省社科院,1980年调省作协,从事专业创作,一级作家。著有诗集《春风啊,带去我的问候吧》《沉吟集》《天落水》;散文集《墨色花小集》《荷上珠小集》《小天地庐漫笔》《落日楼头独语》《白下晴窗闲笔》等。

早年写诗,50岁写散文,65岁习画,为诗、文、书、画四绝之当代才子。

忆明珠是我学诗路上崇拜的诗人之一。他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诗作,曾让我这个痴迷于学写新诗之人如痴

如醉。

我敬重忆明珠,敬重他有一颗真诚坦荡的诗人之心。他不是那种春天来了唱布谷,夏天来了唱黄莺的诗人。忆明珠写诗作文动的是真性情,那是灵魂的叫喊,心潮的涌动……所以,他的作品才那样的隽永耐读,才那样的真切动人。

我和他的亲近还有一个原因,那便是家乡情结。我出生在扬州市江都区原嘶马镇(俗称五圩),他的第二故乡在仪征(俗称十二圩),同属长江水系,都在扬州地区。家乡的诗友和他都熟,我早年因回乡匆忙而与他多次失之交臂(只有一次在江都车站与他邂逅相遇,因彼此所乘车辆即将开动而匆匆握别)。然“飞鸿留声”,每每捧读他的信札,如闻其声,如见故人。

朋友们说,忆明珠是个怪人,一是脾气怪,不肯流俗,爱走偏锋,他是一朵“不肯红的花”;二是生活习性与众不同(睡前必泡一壶浓茶,喝之方能入睡);三是无师自通查打正着。长江文艺出版社早年推出的“古今四大才子”一书,将才子标准定为“诗、书、文、画”四绝。根据这一标准,泱泱华夏众多诗星文魁中,遴选出资平凹、冯骥才、汪曾祺、忆明珠为当今四大才子。



忆明珠书法作品

当今世界,乃信息社会,大家都耳聪目明起来。可忆明珠仿佛看不到这一切,淡然处之。他不喜欢社交,也极少出门,几乎把自己封闭一隅。面对美丑杂陈的开放社会,他心如止水,寂寞地活在自己的天地里,不为物喜,不以己悲。他认为:“人活在世上真正属于自己的只有心这一方寸之地。一个作家,惟有作品是自己的,其他都是身外之物。”忆明珠听不得闹市喧嚣,看不得俗尘油烟,静静地栖守着心的“方寸之地”,写着宁静而纯美的诗和文章。忆明珠集诗书画于一身,可他归根结底是个诗人。他是区别于一般“写诗人”的“诗人”!

诗常有,而诗人不常有,时下尤甚。读忆明珠的文章,便可领略那种属于民族文化的根底,如先秦之简约朴素,魏晋之思辨通脱,唐之心与物游,宋元之风致韵味以及明清的自然平淡等等;读他的诗,更能触摸到一颗属于诗人的挚爱心灵。有了这份爱,心灵才有了家园。读者不难从他的诗文中品味到多重意义上的心灵疼痛——这个山东硬汉生命历程上的几度失声:恋人坟前的伤怀大哭(方有忆明珠名之由来);战友肩头的痛心号哭(在朝鲜战场面对牺牲的战友);小天地庐内无法抑制的仰天长哭(读到或在电视上看到一些胡编乱造之作)……这些属于人类良知、饱和生命震荡的哭泣,当为诗人的一种注解:诗人,就是把希望和绝望的心灵跋涉化为声声歌哭的人。缘此,我想到已故湖南诗人于沙生前写给我的条幅:“笑着写或哭着写,才是诗人起码的真诚。”

大悲大喜大愤出诗人,这也造就了忆翁的诗性,成就了他饱含智性的写作。他流连于诗国,从朴素的生活历练,到人文的历史叩问;从茫茫的心灵独语,到曼妙的画边沉吟,字里行间,涌动的是智者的灵慧、勇者的抗击,更是仁者的爱心。

诗翁远去,珠光永恒。

# 毕树棠与俞平伯那些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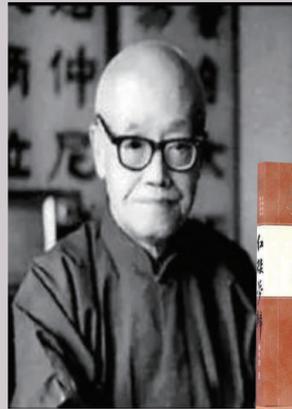
□周凯阳



毕树棠



《集梦集》 毕树棠 著



俞平伯



《红楼梦辨》 俞平伯 著

20世纪初,诸多中国作家在热切地寻求自我价值,其中有叱咤风云的大作家、名利淡薄的小身影,也有今天“文学史上的失踪者”。时至21世纪的今天,比起那些著作等身的作家来,愿为他人作嫁衣的毕树棠老先生,在今朝,可有诸多追寻者?毕树棠逝去近35年了,怀着对老清华人的敬意,在清华大学图书馆特藏部整理他的所有作品过程中,总觉得有一个儒雅作家还陪伴在清华图书馆,可以隐隐感知到一些风雅气息。

## 人间真情细微处

毕树棠与俞平伯同出生在1900年,也同在清华大学工作过。

俞平伯不用多介绍,众人皆知。毕树棠很多人还不熟悉。他1920年毕业于山东第一师范学校,历任清华大学图书馆职员、意大利使馆翻译、天津《民国日报》主笔、清华大学建筑系图书管理员、讲师等。1948年,毕树棠作为知名作家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受到周恩来和董必武的接见。1949年,他又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的首批会员,也是20世纪50年代清华园内惟一的一位作家协会会员,应邀出席全国首届文学艺术大会,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

毕树棠曾收到俞平伯抄送的五言长诗《遥夜闻思引》手书题跋。据毕树棠家人毕可绣回忆:“俞先生工整秀美的毛笔小楷令人赞叹而珍爱。俞先生的自序之后,长诗正文开篇处、结尾处及给父亲的信最后均用了印章,印章的字内容、形状各异,共计五枚。给父亲信落款为:‘愚弟俞平伯识于北平寓斋’。父亲的跋文最后也用章‘毕树棠’,这枚印章我们小时候在家常见,是铜质的,长方形,现在二哥毕可松处收藏。文章所用稿纸均是旧式的黄色竖格纸,长28.8厘米,宽21厘米,(对折两面用)纸边印有‘聽雲館主手鈔本、仿紹興本通鑑行格’字样,父亲的跋文也是用此纸。看来,俞先生当年给父亲手稿时,连同稿纸一起送来,让父亲与他同用一种纸。不过父亲的笔迹不及俞先生工整,且有修改的痕迹。”

抗日战争期间,毕树棠因家庭拖累未能随校去西南联大而留守清华。抗战期间,俞平伯因家庭关系也未能随校南迁,在北京城里和毕树棠家住得不远,两人过从甚密。据毕可绣回忆:“小时候曾听妈妈说,1942年爷爷病逝,那是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俞平伯先生的父亲——晚清探花俞陛云老先生,亲临我家为我爷爷主持‘点主’仪式,并亲笔点主。妈妈说,老先生穿着令人炫目的朝服,仪态富贵而庄严,给困境中的我们一家以极大的安慰。这也是俞平伯先生对父亲坚守民族气节、坚强地活下去的精神支持。”

1954年开始,全国开展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把他与胡适挂上了钩,把唯心论的帽子往他头上扣。据毕可绣回忆:“一日,父亲去参加作家协会批判俞平伯的大会,进场一看,众人坐在一起,俞先生一人孤零零地坐在另一边,可谓设计分明。父亲毫不犹豫地坐在俞先生身边。父亲说:‘我的行为让许多人讨厌,但我必须这样做。’会议期间,上台发言的人都疾言厉色,下台来却与俞先生热烈握手。父亲说:‘我实在不

明白这是为什么。’父亲在这次批判会上的表现,是他绝无仅有的一次锋芒之举,虽然对困境中的俞先生来说,也许是无足轻重的,却是父亲对挚友的大义支持,令我敬佩。”

## 品格高尚的“活字典”

毕树棠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奇才”?他有诸多名家好友,又有诸多著述,尤以散文、文学评论、译著见长。素有“笔名大王”之誉的陈玉堂,在其所著《中国近代人物名号大辞典》中提供了毕树棠的两个笔名:碧君、民犹。笔者收集毕老资料数月有余,也只见他的作品用毕树棠、碧君、民犹这三个笔名。他家境贫寒,靠着父母的东借西凑读完家塾,到民国初上完小学,考入济南第一师范学校。国难家贫激励着他勤学苦读。每逢到了寒暑假,父母借钱给他当路费回家,他却舍不得花掉,把钱交了英语补习班,以至于父母每每站在窗前望穿秋水等着他回家。他1921年到清华大学图书馆工作,在工作中自学外语,主攻英语,兼学法语、德语、拉丁语、俄语,被清华师生誉为“活字典”。他在校内出版物《书报介绍副刊》中撰写的中外书报介绍,几乎期期都有他的这类文章发表,向读者通报出版界的消息和世界文坛动态。抗日战争期间,毕树棠留守清华,“七七”事变后就被清华大学校方高层确定为校产保管员之一,成为名副其实的清华“watchman”。季羨林在《温馨的回忆》一文中说:“我在校时,有一位馆员毕树棠老先生,胸罗万卷,对馆藏书籍极为熟悉,听他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学生们乐意同他聊天,看样子他也乐意同青年们侃大山,是一个极受尊敬和欢迎的人。”毕树棠的翻译始于1922年,绝大多数发表于《晨报副刊》,散篇共有20余篇。20世纪50年代他翻译了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著作《密西西比河上》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翻译了英国作家司各特的《圣·罗南之泉》,翻译小说集《贼及其他》,翻译了法国作家左拉的《一夜之爱》等。毕树棠不愧“活字典”的名声,翻译的作品幽默、感人,要怎样有趣的灵魂才能发现并翻译出这么有趣有价值的著作。仁者好幽默,因其能使人愉悦心,心宽气朗。幽默的东西,能供喜者读之颜开,怒者读之解恼,哀者读之欢欣。他应时任清华建筑系主任梁思成之邀翻译《建筑十书》,但未能付梓。据他的女儿、清华附小退休教师毕可初老师回忆:“小时候每次半夜起来,懵懂中不知是几点钟,记忆中爸爸的台灯总是亮着,昏黄的灯影里,爸爸总是一会儿翻翻书,一会儿写写字,奇怪,爸爸好像从来睡不着。”

学校被日军占领后,毕树棠便到中国大学、辅仁大学等校教中文,有时还到中学兼课,并从事翻译(曾在意大利驻华使馆任翻译)和写作,以解决全家13口人的吃饭问题。当时,周作人聘他到北京伪教育部任职,毕树棠坚辞不就。毕树棠非常淡泊名利。毕树棠之子毕可松说他父亲在清华时做一般管理工作,还为学生设计提供帮助。他广博的学识为师生所佩服和敬重,称他“活字典”。毕树棠先生也非常关心年轻人。系里有位青年教师王乃壮业余时间跟毕树棠学外语,毕树棠还帮他翻译出版了一本法文资料,既不署

名,更分文不取,王乃壮于是给毕树棠画了一幅素描像相送。

## 此情温暖人间

俞平伯191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任教。曾参加中国革命民主同盟、新潮社、文学研究会、语丝社,与朱自清等人创办《诗》月刊。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俞平伯积极响应,精研中国古典文学,执教于著名学府。俞平伯是“新红学”的开拓者之一,是一位热忱的爱国者和具有高尚情操的知识分子,他提倡“诗的平民化”,其主要著作有《红楼梦辨》《红楼梦研究》《冬夜》等。

据《俞平伯年谱》记述:1938年,俞平伯被中国大学聘为国学系教授不到两年,就邀请毕树棠到中国大学国学系讲授“欧洲文艺思潮”课程。文中提及,“当时毕树棠居住在北平东城炒面胡同,与俞平伯为近邻,经常晤谈,互倾积愤,抗战时期竟成莫逆。”

毕树棠之子毕可松在《会员父亲毕树棠》里写道:“抗张爆发,清华南迁。我们家人口多,老小拖累,只能留守清华保管会。日寇占了清华园,我们家搬到城里东四前炒面胡同。生活极其艰难,可父亲坚持不任伪职,到学校教书代课,翻译作品挣钱,全家十几口人靠父亲的一支笔维持生活。这期间爷爷、小叔先后病故,可谓雪上加霜。俞平伯为了帮助父亲,请父亲给他的孩子当家庭教师,每月50元。父亲说:‘那时没有这么高的价,的确是雪中送炭。’”

《俞平伯年谱》1945年9月24日记载:“五言长诗《遥夜闻思引》”毕。此诗写于1942至1943年间,其时燕冀沦陷已久……10月将《遥夜闻思引》原稿寄朱自清、叶圣陶、朱、叶对诗中深入而不能显出之病均提出中肯意见。此后谱主对《遥夜闻思引》不同写本题跋语多则。”1945年11月28日,俞平伯为自写《遥夜闻思引》条幅赠毕树棠作一跋语,次年在天津《大公报·综合》副刊上发表。

据毕可绣回忆:“我家这份手稿是俞平伯先生的第三份手抄本,完成于1945年11月28日,次年1月31日赠予父亲。我家还有一本《遥夜闻思引》的线装影印本,是北平彩华印刷局出版,据《俞平伯年谱》记载,其封面是俞平伯先生的夫人许宝驯写的,此书只影印了一百册。”这是一份珍贵的遗物,它反映了两位老人的深厚友谊。

1972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俞平伯下放五七干校劳动,后来回京。听说俞平伯回北京了,已72岁的毕树棠,身体很不好,却执意自己进城,登门拜访俞平伯,畅叙一番。临别,俞平伯以一本《林屋山民送米团卷子》相赠。该书内有徐悲鸿等许多大家的题咏,封面是胡适的亲笔,非常珍贵。据毕可绣回忆:“父亲有些激动,拿出这本书给我看,并说:‘你们兄妹中,只有你是学中文的,送给你做个纪念吧!’这可能是父亲和俞平伯先生的最后一面,因为不久后,父亲就因脑中风病倒,虽经祝谌予大夫的精心治疗后大好,但身体虚弱行动不便。这本书我已捐给清华大学。”

逝者已矣,我们对文坛前辈们的敬重和缅怀之感常伴。

字里行间,鲜活的思想仍然给我们以丰富学养,令我们有阅读的清爽与欢欣。

